

史、蒋矛盾冲突与美中战时利益分歧

陈 国 清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国清(1951-), 男, 湖北浠水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 主要从事民主革命时期中外关系研究。

[摘 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史迪威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官和中国战区蒋介石总司令的参谋长, 来华工作两年半时间。此间, 史迪威与蒋介石发生三次矛盾冲突, 三次冲突的直接原因皆与军队指挥、控制权和租借物资统制权相关, 深刻原因则是中美两国政府战时利益之分歧。

[关键词] 史迪威; 蒋介石; 矛盾冲突; 利益分歧

[中图分类号] K26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1-0084-06

约瑟夫·史迪威在美国部队里以“尖酸的家伙”这一诨名著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1942年3月来华, 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官和中国战区蒋介石总司令的参谋长, 在华服役两年半。此间, 史迪威与蒋介石自始至终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乃至冲突, 蒋介石不仅充分地领受了史迪威的“尖酸”, 而且有时甚至近似侮辱。为此, 蒋介石曾多次想赶走史迪威, 1944年9月的“指挥危机”终于迫使罗斯福将史迪威召回美国。史蒋矛盾冲突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史蒋冲突的发端、形成及其原因, 是研究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自1944年10月史迪威离华至今, 对于史蒋矛盾冲突的解释, 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评论, 一说是史蒋个人气质缘故; 一说是史迪威越权而致; 还有的说是因“容共”与“反共”分歧而起; 也有争权说和多因素说。总之, 各执一端, 不一而足。据笔者看来, 史蒋冲突的直接原因和具体表现是因权力而起, 因权力而终, 而间接的也是最根本、最深刻的原因则是战时中美统治集团利益分歧所致。

一、史迪威赴华使命上的分歧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基地, 宣告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下旬, 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华盛顿召开“阿卡迪亚”会议, 确定了英美联合作战的大致规划。在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该会的情况下, 美英领导人决定成立中缅印战区, 事后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这项决定, 并接受所派遣的一位美国司令官监督该战区的美军组成部分。1942年1月5日, 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建议, 但条件是他本人仍然要担任中国本部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和当时驻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宋子文希望能派一位“恰当的美人”, 这位官员“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 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体制知道得越少越好, 他的任务是接受别人的授意加盖橡皮图章, 只帮助催促美援而不过问中国的政治、军事^[1](第95页)。然而, 美国陆军部却遴选了史迪威这位中国通, 而不是一位中国问题的“生手”。史迪威曾长期在中国生活过, 从1911年来华到1939年返美, 其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美国军界和外交

界属于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与蒋介石所期待、所要求的人选条件显然不合。这表明史迪威出使中国主要是美国方面“塞”给蒋介石的。这就为日后史蒋的共事投下了阴影。

史迪威赴华的使命问题,中美双方看法也不尽一致。美国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给史迪威交代的任务是“协调、消除障碍,使(滇缅)公路畅通,将各派召集在一起,掌握指挥权,将任务交给他们。钱不成问题”^[2](第11页)。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命令是“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2](第12页)。而中国方面对史迪威使命的理解是“为中国监督和控制所有美国防务援助事务;在大元帅(蒋介石)之下指挥所有在华美国部队和可能指定给他的中国部队;在任何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战争会议上代表美国,并担任大元帅的参谋长;改善、维持和控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2](第12页)

上述美中关于史迪威来华使命的措辞,显然不尽一致。美国方面赋予史迪威来华的任务是为战时美国利益而争控军事指挥权,蒋介石方面则将史迪威在华的工作定位为“委员长的参谋长”,这是一个权力不大明确的职务,并且前提是“为中国”、“在大元帅(蒋介石)之下”。在中美这种各有所求、各有所图的前提下使华的史迪威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开始就陷入了中美矛盾之中。而史迪威本人则是一位美国利益至上的代表人物,一旦中美利益发生冲突时,当然要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同时,美国统治阶级本来就视史迪威为中美关系这盘棋上的一颗棋子,史迪威日后的进退,自然由不得他自己了,他在华的成功与失败,也不是他个人能掌控得了的。

二、史、蒋三次冲突及矛盾焦点

从1942年3月史迪威来华到1944年10月离华,其间两年半的时间里,史迪威与蒋介石在一系列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由于他们之间的矛盾时而激化时而缓和,故而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妥协总是交织进行,他们的冲突规律主要是随着史迪威对蒋介石逼迫、控制的轻重缓急而变化,每当这种逼迫和控制超过了蒋介石忍受的限度,威胁到蒋介石的生存时,蒋介石就发出驱史信号,一旦对方退让,或给予补偿,蒋介石就适可而止。蒋介石在1942年、1943年、1944年的秋季连续三次要求史迪威离开中国。史迪威可谓是深深地领教中国秋天的“肃杀之气”。

第一次驱赶史迪威基本上是被美国方面强硬态度所遏止,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第二次驱赶史迪威以宣传舆论为主,最后因蒋介石政权内部纷争,结果是虎头蛇尾收场。第三次驱赶史迪威,以蒋胜史去而告结束。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三次冲突较量的成因及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次冲突较量是因中国援缅远征军缅甸作战失败,史迪威要求改革国民党军队,蒋介石不能忍受史迪威对其军权的挑战。1942年3月史迪威来华,史蒋会谈后,史迪威入缅指挥中国第5军和第6军。可是,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上指挥不动这两个军,部队的进退皆以蒋介石的密令行事,史迪威的指挥权有名无实,成为一个光杆司令。为此,他强烈要求指挥实权。蒋介石对他先是口头保证,继而答应给予关防以确定史迪威的权力,“当一个星期后关防送到时,它与原来许诺的名义大有出入,有了重要的变更。上面所刻的文字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也没有送来给予赏罚之权的信件。第38师的官员,在战后说不论蒋介石在眉苗口头上是如何说的,关防上的‘参谋’两字指明史迪威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而他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2](第23页)。

史迪威从缅甸脱险后,几乎刚一到印度,就满腔怒火地写了一份50页的缅甸作战报告。报告中一方面抨击英国人只关心印度殖民地,与中国人不合作;另一方面严厉指责蒋介石阻碍了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工作,认为中国现有的政治、军事组织事实上是无可救药,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必须重新对中国军队加以整训、装备。史迪威在5月26日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谈到中国军队的虚弱,部分是由于缺乏装备,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师和军的司令官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去前线,对前线送来的夸大的、错误的报告不加核实地予以接受。史迪威提议对无效率的高级司令官要严格清除,部队要统一指挥,不受任何

人干预^[2](第 29-30 页)。20 天后,宋美龄在一次会议上说,史迪威将军所倡议的激烈措施不能采用,必须“现实”。并说“头不能砍下来,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2](第 39 页)。这是对史迪威 5 月 26 日备忘录的惟一反映。其间,史迪威与蒋介石曾有过几次会晤,主要谈论在印度训练中国部队的问题和美援问题,避而未谈整顿中国陆军之事。蒋介石为了不使史迪威再纠缠这个问题,转而以守为攻,6 月 26 日召见史迪威,要他引咎自责,指出他的职责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其任务是全心全意地根据“租借法案”争取更多的美援,不必把精力花在徒劳无益的军事作战上。几天后,蒋介石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1)遣调美军三个作战师来华;(2)立即建立一支拥有 500 架作战飞机的空军,可以由陈纳德指挥;(3)每月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 5 000 吨物资。蒋介石认为这三项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不能毫无援助地再打下去”,将“作出其他安排”^[2](第 33 页)。对此,史迪威一方面去信华盛顿要求不要理睬蒋介石的威胁,另一方面针锋相对地答复蒋介石:(1)中国的成败既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尖端武器,战胜日本的关键在于军事改组;(2)他本身主要是中缅印战区全部美军的指挥官,从而也是“租借法案”的执行官;(3)也是最次要的,他的一个头衔是蒋介石的助手,并且后者必须服从前者^[2](第 34 页)。这当然深深地刺痛了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是美方在干涉中国内政,通知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他促使白宫召回史迪威,另换他人,并争取租借物资的分配权。但是,马歇尔回答宋子文说,他们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可以召回史迪威,他的继任者仍将担负与史迪威同样的任务,对“租借法案”武器行使同样的控制权^[2](第 35 页)。此后,史蒋关系日趋紧张,8 月份美国总统的特使柯里访华时,蒋介石仍坚持要撤换史迪威。由于马歇尔和史汀生的极力阻止,罗斯福对中方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就采取不加理睬的态度。而蒋介石则因为罗斯福 10 月 12 日答复了他的三项要求中的后两项,自己的权力基础和自尊心都得到了保全,也就不再提驱史了。这样,第一次史蒋冲突化解。

第一次史蒋冲突,虽然蒋介石未能撵走史迪威,但蒋介石以“最后通牒”的方式从罗斯福那里获取了 500 架飞机和一批物资。这种物资上的补偿,填补了蒋介石精神上的损失,史蒋之间的较量打成了一个平手。同时,这却为史蒋第二次冲突留下了伏笔。第二次史蒋之间的冲突、较量本质上还是第一次冲突的继续和发展。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并没有展开正面冲突,主要是通过双方的代表相互宣传、攻击,史蒋之间矛盾的焦点不像第一次那样集中和突出,史蒋二人也未分出高低输赢,牺牲的只是第三者。

自 10 月 14 日美方答复了蒋介石的三项要求后,史蒋矛盾暂告平息。史迪威开始着手准备 1943 年春在缅甸发动的军事攻势。但是,这一计划刚一订出,立即遭到英国的反对,英方坚持要推迟到 1943 年 11 月发动攻缅作战。接着,蒋介石于 1943 年 1 月 8 日也正式向罗斯福表示不同意渡过萨尔温江发动缅甸战役,理由是收复缅甸必须海陆联合作战,没有这个条件,最好推迟到秋季。为此,史迪威很恼火,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佬真损。这种局面正中他们的心意。如今他们要溜了,中国人也要溜了”^[1](第 121 页)。“现在除非我们态度强硬,逼着委员长遵守诺言,否则他就会永远从我们手中溜掉。”^[1](第 121 页)史迪威认为,如果马歇尔同意的话,就以华盛顿的名义发出通牒,而不提及罗斯福,这样才能“使这个刁徒老实起来”^[1](第 121 页)。但是,在 1943 年 1 月中旬丘吉尔、罗斯福分别出席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史迪威的缅甸作战计划被否定,并且罗斯福此时开始重视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指示陆军部和马歇尔增加陈纳德而不是史迪威的物资支援数量。这样史迪威继改组中国军队失败后,开辟滇缅公路的计划也成泡影。而蒋介石则在策略上施行“以夷制夷”,在 1943 年里,使空中战略鼓吹者陈纳德与地面战略鼓吹者史迪威展开了一场竞争。史迪威与陈纳德双方施展了各种手段争权邀宠,不断地进行明争暗斗,他们不仅谋求华盛顿方面的支持,而且也注意与中国的权势人物勾结。陈纳德在中国占上风,在美国陆军部虽然没有影响,但罗斯福却不主张史迪威和马歇尔的“强硬政策”,同意逐步增加通过喜马拉雅山航线运送物资援助中国。这不能说不是对陈纳德的一种支持。故此,史陈二人势均力敌。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斗争开始由公开变为隐蔽,合法变成“非法”。1943 年的头几个月,史迪威制定了一些“排除蒋介石”、“渗入和控制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认为,王浩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驻华的使团并不是使国民党永世长

存,而是要使军队成为一部得心应手的机器”^[1](第131页)。但是,这些密谋都未贯彻。不是史迪威不想付诸实施,主要是他考虑到中国军政集团内没有比蒋介石更有能力领导中国的人。对于蒋介石来说,为了防备不测和争夺美国战时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权,他派遣宋子文赴美,努力在美国人中消除由史迪威所引起的不良影响。这样,1943年整个夏季,史迪威在重庆和白宫均遭遇冷落,他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直到9月份以后,史迪威的活动才频繁起来。因为,陈纳德击败日本的空中战略已经叫得不响了,日本侵略军突袭了陈纳德基地以回敬陈纳德的空袭。9月1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军对陈纳德计划的反应,同时也拨一些武器给共产党部队,作为对其抗日行动的鼓励。与此同时,史迪威又开始插手蒋政权内部的权力之争,企图以宋子文和陈诚取代蒋介石、何应钦。建议援共和插手内政,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于是史蒋再起冲突。由于新任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上将出于自身利益,不愿有人把他的副手、最精通中国问题的史迪威从其身边弄走,认为“如果把指挥中国军队近两年时间的史迪威撤换掉,他无法实施运用中国军队作战的计划”^[3](第568页)。同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萨默维尔施展了他全部的圆滑手腕和劝说本领,宋氏姐妹宋蔼龄、宋美龄又从中活动。这才使蒋介石撤回了向萨默维尔提出的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这次冲突中,史蒋双方未正面交锋,史迪威图谋“排除蒋介石”,谋而未践,蒋介石驱赶史迪威虎头蛇尾,双方都有些投鼠忌器的意思。而宋子文则受牵连,以后被蒋介石冷落,离开权力舞台一年。

第三次史蒋冲突,双方都是孤注一掷。1943年12月,美、英、苏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在“扶蒋”还是“去蒋”问题上一度产生过动摇,曾口头表示史迪威可以考虑去蒋,“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又不能把他换掉,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1](第153页)。史迪威自恃有罗斯福的支持,再次请求罗斯福逼迫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罗斯福于1944年7月6日致电蒋介石要求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7月8日蒋介石复电,表示原则上同意,但要求“必须有一个准备阶段以便史迪威得以对中国部队行使绝对指挥权,而不致有任何障碍”^[2](第108页)。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三项条件:(1)共产党军队不得接受史迪威指挥,除非他们同意接收中央政府的命令;(2)对于史迪威和他的关系的地位应当明确规定界限;(3)租借法案援助要处于中国政府或其总司令权力之下^[2](第112页)。8月28日,罗斯福给蒋介石的回答,语气傲慢,基本上否定了蒋介石的三项要求。蒋介石则对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拖而不办。史迪威为了攫取指挥权,频频去函华盛顿要求白宫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压。9月16日,终于盼来了罗斯福给蒋介石的最后通牒,史迪威看到电文中有“让史迪威将军能够毫无约束地指挥你方的全部军队”这样命令式的字句,兴奋不能自抑。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快感,亲自将电文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毫无表情地看了一下电报译文,“除了脸色变得苍白和丧失说话的能力外,他没眨一下眼睛,他只对我(史迪威)说:我明白了”^[3](第127页)。9月24日,蒋介石由赫尔利向罗斯福转交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保证“支持任何一名适于被派来中国担任野战军司令官的美国官员”。但是,“史迪威将军不适合于新的指挥权所给予的重大、复杂、需要审慎的职责”^[3](第130页)。这样罗斯福面临着是抛弃中国还是抛弃美国将军的选择。罗斯福尽管对蒋介石有过不满,甚至考虑“去蒋”,但那只是短时间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支持蒋介石仍然是他对华政策的实质。故此,在要中国还是召回史迪威的问题上,他当然是选择前者。于是10月19日史迪威被召回美国。

三、史、蒋矛盾的根本症结

自1942年3月史迪威来华到1944年10月离华,史迪威与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发生过矛盾冲突,有些问题甚至错综复杂,但归纳起来,史蒋冲突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权”字。具体表现在:(1)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2)租借物资的管理权;(3)对中共问题的处置权。这三者中,指挥权则是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自始至终是史蒋矛盾的主线。史迪威先是争取局部的指挥权,继而是争取全面的指挥权。而蒋介石在军队指挥权上始终不作重大让步,他认为史迪威的作用主要在于催请美援。当史迪威催逼太紧,白

宫压力过大时,蒋介石便有限度的让步,但整个中国战场军队的指挥权是坚决不交出的。为此,史迪威也用尽心机,一是亲自组织训练新军,二是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试图以裁汰旧将校,任命新人,进而取得国民党军队事实上的指挥权。当他的计划不能如愿时,就利用租借物资的统制权,卡蒋介石的脖子,甚至扬言要武装共产党,以此来要挟蒋介石。

史迪威虽然在二次大战后期也步入美国四星将军之列,其地位与影响实际上并不及军界同仁艾森豪威尔、马歇尔、麦克阿瑟等,何以敢在当时号称四巨头之一、集中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面前咄咄逼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史迪威身后有美国统治集团做后盾,史蒋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中美两国统治集团战时的矛盾冲突的反映或折射,是战时中美关系折冲的一个缩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国的抗战,基本上是持观望态度,奉行孤立主义,为了避免与日本作战,甚至想牺牲中国。珍珠港事件后,尽管美国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但此时美英联席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先欧后亚”。美国当局为了减轻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最近政策是利用中国拖住日本,其办法是加紧对蒋介石的援助,并努力“使中国成为大国”,以此满足蒋介石的虚荣心,不让中国崩溃,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忠实伙伴和支持者。史迪威是美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他的许多做法是为了尽快打败日本,这是符合美国当前的根本利益,所以得到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支持。后来既然日本战败的趋势已定,从将来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计,当然不能失去中国,因为利用中国可以遏止苏联,抵制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和发展。因此,不难看出,史迪威的得势与失势皆反映着美国在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问题上的态度。一旦史迪威完成了美国最近而迫切的使命,其进一步的行动有碍美国将来在亚洲的利益,当然他必须从中国离去。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抗战初期呼吁美方援助,但收效甚微。当初战受挫时,转而消极避战,保存实力,静观时局发展,希望日美开战。由于珍珠港事件的发生,蒋介石集团极为兴奋,认为美国参战对于战事好转有利,从相信美国的力量转向一味依赖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援助。不愿付出更大的代价、作出更大的牺牲。更多的是考虑到未来自身的利益,即国共之间的较量。为最近的利益计是拖住美国,向美国当局漫天要价;为将来的利益计,则尽可能保存实力。这就与美国当局的最近目标和利益发生了冲突。这即是史蒋矛盾的症结。蒋介石集团希望最大限度地获取美援,最小代价的付出牺牲,这与美国方面提供援助的初衷相悖,故而美国当局就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驱使蒋介石抗击日军。而史迪威这个美国统治集团中的“强硬派”代表,往往使用美国对付小国领导人的态度来对待蒋介石,这不仅蒋介石本人受不了,连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也甚感屈辱。如何应钦抱怨说:“我们所需要的物资都要由美国人决定。作为运交这些物资的条件,他们要训练我们的部队。甚至应当训练哪种部队,也要事先由他们决定。训练以后,他们要通过联络官保持对部队的控制权。所有这些都是与美援有关的相当麻烦的问题。”^[1](第 132 页)可见,蒋介石多次驱赶史迪威,实际上是两种利益的冲突,蒋介石反对史迪威其实是变相地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钳制。蒋介石从表面上还竭力装出这是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从本质上讲他是在为自己的统治着想。蒋介石明白一旦失去军队的控制权,美国当局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随时有换马的可能。他也明白,他的军队若是让史迪威全部拿去与日本人作战,即使不被消灭,也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他已预感到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力量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国民党政权的生存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无论从自己的统治权,还是本阶级的利益,蒋介石当然不愿轻易地放弃对军队的控制,不愿他的军队在美国人的指挥下与日本人作拼死的决战。此外,从面子上看,堂堂一位中国战区统帅听命于一位普通美国将军,这也是蒋介石所不能忍受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史蒋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当时中美两国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美方在一系列权力上紧逼不舍,主要出于为自己的最近利益着想;蒋介石丝毫不放松军队的控制权,主要是着眼于自己的统治权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未来的生存。尽管美方没有最终争得中国军队的全面指挥权,但始终外在矛盾的主导地位,并保持对租借物资的统制权和部分地控制着中国军队的组织训练。

还参与了中国军官的任免决策。蒋介石虽然保住了军队的控制权,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处于防守被动地位,始终只把斗争矛头局限在史迪威一人身上,不敢扩大到美国统治集团,充满了妥协和屈辱,总是有意和无意地把自己置于仆从位置,这充分地反映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对美政策的妥协和依赖的真实面目。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中美统治集团在短期和长期内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即日本侵略者和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可以调和的,在一定的時候对于某些问题可以相互妥协、相互退让,不计前嫌而达成新的妥协和合作。

[参 考 文 献]

- [1] [美] 迈克尔·沙勒.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M]. 郭济祖,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第2辑(史迪威资料)[G].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3] [美] 巴巴拉·塔奇曼.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M]. 陆增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责任编辑 桂 莉)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Stilwell and Chiang Kaishek & Different Benefit between U. S and China during WWII

CHEN Guoqing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Guoqing(1951-),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and foreign relationship in Democratic Revolution.

Abstract: After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as army's commanding officer in the local of which covered China, Burma, India. Simultaneous, Stilwell was the general commanding officer of Chiang Kaishek chief of staff in China. During the two and a half years when he worked in China, Stilwell and Chiang Kaishek occurred three times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The direct reason was about the army of conduc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rule of concession material. The deep reason was difference of benefi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Key words: Stilwell; Chiang Kaishek;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difference of benefit